

# “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sup>①</sup>

## ——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姚俊

**摘要：**本文通过对长三角五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实证研究发现：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虽然在留城发展选择上相差无几，但在城市面向的非农发展取向选择上要显著提高；这一结果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变迁结果在两代农民工两个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事实证明新生代并非是优于老一代的“精英一代”，对于新生代来说关键在于要将其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自身“新”能力的建设上来。

**关键词：**农民工 新生代 发展取向 非农化

### 一、引言

代际视角的引入是近年来农民工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明确提出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群体特征、城市适应与融入、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与权益维护等诸多方面。但所有研究似乎都持有这一观点，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各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除此之外，大多研究都认为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对城市的天然亲近感和对乡村的排斥，市民化或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这两种预设的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代际特征的影响以及其向城市流动的发展取向被夸大了，我们认为就这两个问题，目前下定论为时过早，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数据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在未来发展取向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绝不仅仅是留城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受到个人因素、制度因素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这一点上，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环境和困境是一样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新生代还遇到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比如他们不仅面临融入城市的困难，同样还面临返乡生活的适应性问题（何绍辉，2008：9）。事实上，农民工（也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取向，不仅局限于城市融入这一出路，还应包括返乡非农发展和返乡务农两种选择。本研究即是要通过实证数据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三种发展取向间的分布情况，分析其选择不同发展取向的影响因素，以此来回应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融入城市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王春光，2010：73-5；刘传江、程建林，2008：49）。同时，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比较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代际特征的影响是否真的有那么显著，并基于此来回答本文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包括未来发展取向在内诸多方面的显著特征，可能只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在其身上的集中投射，但这种影响是有层次性的，并且在不同代际农民工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层次。

### 二、文献回顾

有关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研究，集中在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回流行动上，实证数据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发展取向总体不强烈（黄乾，2008：21；吴兴陆，2005：5）；就具体研究而言，由于样本和分析框架的差异不同研究在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共性：月收

<sup>①</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嵌入性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项目编号：09CSH044）的阶段性成果。

人和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的影响不显著(黄乾,2008:21;熊波、石人炳,2007:52;姚俊,2009:96)。与留城意愿只是近来才出现不同,回流作为一种体制性现象伴随着农民工流动的始终。诸多调查都发现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具有很强的回流意愿,并且事实上成为回流农民工的主体(周大鸣、姬广绪,2010:75;白南生、何宇鹏,2002:67)。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分析,存在着多种分析模式:制度和环境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普遍的分析路径,其理论代表是回流的“推-拉”模型,实证数据表明除了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之外,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吸引力显著与回流成正负相关(罗静、李伯华,2008:33)。走向微观的实践分析是另一种路径,从农民工主位研究出发可以看到,“回流”是农民工依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而进行的主体性选择,这种选择更符合农民工自身的需求(周大鸣、姬广绪,2010:78);从生命历程理论中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来判断,“回流”只不过是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不断对自己进行定位的结果,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事件在生命周期中发生的时间点相异,不同代际农民工在返乡历程中的调整速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返乡的过程需要花去更长的时间(袁松等,2009:10-11)。

以上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包括新生代在内的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研究停留在“是否留城”和“是否回流”上,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过于关注城市面向而忽略了回流的视角,即使在回流内部也存在返乡务农与返乡非农发展两种发展取向,因此农民工的发展取向并不是“留城”和“回流”的二元选择,而是空间和职业双向重叠的三种路径。二是已有研究虽然发现年龄对农民工的留城和回流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但分析内容要么是针对全体农民工进行的,要么是单独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缺少对农民工发展取向进行代际间的比较分析。三是定量研究当中由于分析框架不同,针对同样的问题通常得出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作为因变量的发展取向的三项选择以及进行两代农民工间的代际比较要求我们建立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针对这些局限性,本研究提出从农民工主位视角出发,分析两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上的差异,并比较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的异同。

### 三、研究设计

#### (一)概念界定、指标测量与方法

##### 1.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王春光在 2001 年提出,他从年代与年龄特征、教育特征、务农经历和外出动机的变化四个方面的群体性特征来甄别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66-7)。后续研究大多延续这一分析模式来界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特征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将年龄和代际作为最重要和直接的定义标准。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口学特征上(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社会保障等)的显著差异也是对其进行界定的重要标准,但不同样本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差异存在着一定争议。因此,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年龄上都在 25 岁以下,从代际上看都属于“80 后”和“90 后”一代;二是由年龄和代际在他们身上形成的鲜明代际特征,这些代际特征是他们成长环境的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观念和行为导向上,包括他们更加能够适应外出打工生活、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将打工看作是一种发展的手段、对家乡的认同更加淡漠等等,诸如此类的变化核心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逻辑从“生存”到“发展”的转变。在实际操作中,本研究将 25 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 52.3%,这与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调查研究的结果(王兴周,2008:52)相接近,说明这一操作化方法是合适的。

##### 2. 指标测量

(1) 因变量。发展取向,是指农民工对以后就业领域和生活空间的预期。在问卷中,我们通过问题“您今后的打算?”来获取农民工发展取向的信息。根据农业和非农就业和城乡生活空间形成

的列联表,最终将发展取向分为三种: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发展和留城发展。其中留城发展包括“买房定居”和“不买房也要待在城里”两类。

(2) 自变量。已有关于农民工留城和回流的研究往往强调农民工行动的结构约束性,而忽略了其行动的自主性,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主位出发选择自变量,同时考虑到代际比较的需要,最终将自变量分成四类因素:一是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文化程度、收入和户籍现状,其中户籍现状是制度性制约因素。二是外出动机,通过“是否属于生存型外出”和“是否属于发展型外出”进行测量。三是社会保障,考虑到养老保险缴费的持续性和对未来生活稳定预期的重要性,选择养老保险作为影响农民工发展取向的社会保障因素,通过“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新农保”两种不同城乡面向的养老保险进行测量。四是工作状况,其中:外出务工时间是最关键的指标,能够反映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程度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水平;务工人员性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工作方式、权益保障等制度性信息;通过“换单位次数”和“换城市次数”来测量工作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在固定城市的稳定就业有利于增强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取向。

另外,关于农民工留城和回流的定量分析都将家庭结构因素作为一类重要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配偶和子女是否伴随流动对农民工的留城或回流决策影响显著(王春兰、丁金宏,2007:72;罗静、李伯华,2008:33),家庭因素成为农民工回流或返乡的重要“拉力”。但家庭因素影响力的上升实际上是和农民工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联的,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不断对自己进行定位(袁松等,2009:10),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家庭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考虑到本文的理论指向在于分析两代农民工在同样经济社会变迁结果下行动选择的异同性,因此,在自变量选择上没有考虑农民工的家庭结构因素。但是,虽然从逻辑上说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的选择上更可能受到家庭结构因素(比如是否为长子、父母状态等)的影响,但近年来整个社会家庭价值观念、孝道观念的变化或多或少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所体现,或许家庭结构因素对于新老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影响不再简单表现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任务、期待的不同那么简单,从上述方面来说这是本研究的一项缺陷,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资料加以分析。

### 3. 分析方法

根据农民工发展取向分为“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发展”和“留城发展”三种,以“返乡务农”为参照组,利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发展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为检验代际变量对发展取向的影响,先将所有样本纳入模型分析,后通过分别建立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分析模型,比较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的差异。

####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3月对长三角地区五市(县)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抽取的江阴、无锡和昆山市属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溧水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其周边县市;阜宁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当地,以上农民工来源地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具体抽样过程根据当地工商企业名录进行系统抽样,共发放问卷500份,全部回收,问卷中符合本研究要求的问卷为478份。

表1给出了模型中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重明显高于老一代,文化程度也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工作流动程度和收入现状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地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另外,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挣钱生存仍然是他们外出的首要动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国有和三资企业就业。以上信息虽然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一般性判断不一致,但与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结果相符合(王宗萍、段成荣,2010:40-54;杨菊华,2010:46-8)。

表 1 自变量描述性信息

自变量		全样本		新生代		老一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因素	性别	女性	58.1%		62.2%		54.2%	
		男性	41.9%		37.8%		45.8%	
	文化程度		3.15	.624	3.16	.527	3.13	.714
	户籍现状	未迁移	85.9%		86.5%		85.5%	
	迁移到现工作地	8.1%		6.6%		9.4%		
	迁移到别处	6.0%		6.9%		5.1%		
	收入现状		2.84	.849	2.64	.760	3.07	.884
外出动机	生存型	不是	46.6%		39.6%		54.2%	
	外出	是	53.4%		60.4%		45.8%	
	发展型	不是	65.5%		56.9%		75%	
	外出	是	34.5%		43.1%		25%	
社会保障	参加养老保险	是	40.6%		29.5%		52.6%	
		否	59.4%		70.5%		47.4%	
	参加新农保	是	16.4%		20.3%		12.1%	
		否	83.6%		79.7%		87.9%	
工作状况	务工时间		1.95	.901	1.56	.765	2.38	.847
	务工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2.5%		4.0%		0.9%	
		私营或民营企业	67.5%		55.7%		80.3%	
		三资企业	25.9%		37.9%		12.7%	
		个体户	4.1%		2.4%		6.1%	
	换单位次数	2.54	1.279	2.36	1.194	2.75	1.345	
	换城市次数	2.06	1.025	2.02	1.027	2.10	1.026	

## 四、数据结果分析

### (一) 新老代际农民工发展取向描述

表 2 给出了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分布情况。其中,在留城发展取向上,新老两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接近,都靠近 30%,这说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判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数据进行证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返乡意愿上基本一致,都保持在 70%。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表现在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上,63.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非农就业,高出老一代农民工 13 个百分点;相应的,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的比重要高出新生代 12 个百分点,这说明由于缺少务农经历和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回流也很少会从事农业生产。Person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选择上具有显著差异,是哪些因素造成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在多变量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检验。

表 2 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描述 (%)

发展取向	新生代	老一代	所有样本
返乡务农	7.9	19.8	13.8
返乡非农发展	63.5	50.5	57
留城发展	28.6	29.7	29.1
样本数(个)	203	202	405

同时,考虑到变量模型设计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多选题直接测量农民工返乡发展的原因,结果发现:对于老一代来说,排在前三位的返乡原因分别是“靠打工的钱很难买房定居”(24.3%)、“城市生活成本太高”(22.8%)、“需要照顾家庭”(21.7%);而在新生代那里,位列前三位的返乡原因则是“城市生活成本高”(19.6%)、“靠打工的钱很难买房定居”(18.9%)、“城市对农民工的政策不好”

(17.4%)。这说明高房价已经成为农民工返乡发展的重要“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房价的“推力”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不如在老一代身上那么明显。对于新生代来说,“留城发展”并不必然等同于“买房”,能在城市留下来是他们的首要逻辑(这从“城市生活成本高”选项位居新生代返乡原因首位可以看出),他们的城市发展取向更加具有流动性。当然,这一判断还需要通过回归模型得到更多的数据证明。

## (二)发展取向的多项 Logit 模型结果

表3提供了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分析的全样本模型、新生代模型和老一代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模型中,返乡非农发展与返乡务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非农发展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5.7倍;留城发展与返乡务农相比,新生代选择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8.1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有着更为强烈的非农职业转变愿望。

从新生代模型中可以看到,女性相比于男性留城发展取向显著提高,前者几乎是后者的22倍;从受教育程度上看,高中学历的新生代较之小学及以下者在留城发展和返乡务农发展选择上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这说明初始人力资本(学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转变的正向影响力很小,也支持了关于回流农民工容易回到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结论(白南生、何宇鹏,2002:76),同时学历对打算返乡的新生代的职业选择没有明显影响;户籍现状和收入水平对新生代非农发展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外出动机方面,是否发展型外出显著影响着新生代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新生代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这说明没有养老保险的就业大多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类似的低层次就业既不能积累人力资本也不能累积财富,同时缺乏养老方面的未来预期,导致这部分农民工既不能留在城市也无法返乡后实现职业转变;工作状况的四个变量都对新生代的非农发展影响不显著,其中,“外出务工时间”上影响不显著,可能是新生代的外出务工时间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减少了群内差异性所致,务工单位性质没有影响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制度环境。

老一代农民工模型显示:个人因素当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水平无影响与已有关于留城意愿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老一代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有所隐瞒有关。户籍未迁移的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务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外出动机对老一代发展取向有显著作用,不是因缺钱而外出的老一代与缺钱而外出的相比,前者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4.2倍,在返乡务农和留城发展两个选择上,前者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后者的6倍;是否以“出去见见世面”为动机对老一代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对老一代非农化取向没有显著影响。在工作状态变量当中,外出务工时间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正向作用,而在返乡职业选择上,与外出3年以下相比,外出3至5年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这可能与这部分农民工处于外出务工的磨合期有关,他们一方面已经过了刚刚外出时对城市生活的新鲜期,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适应城市打工生活,反而更为怀念务工前的生活状态。反映就业流动性的两个变量对老一代发展取向的影响表现在留城发展上,对于其返乡后的职业选择没有显著作用,其中,换单位次数5次及以上的农民工与1次及以下换单位者相比,前者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5.45倍,换城市次数2次者与1次及以下者相比,留城发展意愿显著降低了。

比较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异: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显著影响,而对老一代没有影响,这反映出两代农民工不同婚姻状况的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大多未婚且有兄弟姐妹,担负的家庭责任很小,因此倾向留城发展;而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大多是结婚生子后外出务工的,担负与男性同样的家庭责任,因而其发展取向与男性没有显著区别。户籍迁移对老一代的非农发展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则不然,这说明老一代外出工作、生活经验更丰富,更能够体会到户籍等制度性要素的作用,或者说更为“顺从”这种制度安排,而新生代一方面由于所处生命历程不同还没有认识到户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更想摆脱这一强加在身上的制度性安排。外出动机对老一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影响比对新生代更为充分,可以看出由于家庭责任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后与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初始外出动机的

表 3 两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多项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新生代模型 Exp(B)		老一代模型 Exp(B)		全样本模型 Exp(B)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返乡非 农发展	留城发展	
农民工代际(老一代) 新生代	—	—	—	—	5.704**	8.149**	
个人因素	性别(男性) 女性	4.096	21.550*	.393	1.378	1.029	2.405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87.266	2.004E-13	1.666	891656	1.557	.277
	高中	247.508	5.813E-6***	4.913	3087776	3.732	.882
	高中以上	189.056	5.695E-5	.978	1975693	6.569	6.191
	户籍现状(迁移到别处)						
	未迁移	2.453	.068	.123!	.018*	.554	.080*
	迁移到现工作地	670213.40	1061570.7	1.704	1.321E-6	.748	1.032
	收入现状(800元及以下)						
	801—1200元	1.339E-5	4.072E-6	2394185	.127	.719	.314
1201—1600元	3.820E-6	9.947E-7	6310002	.245	.993	.301	
1601—2000元	4.578	7.582	2200059	.711	1.083	2.338	
2000元以上	2.475	2.196E-5	2.286E12	244989	1.562E8***	7.303E7	
外出动机	生存型外出(是)						
	不是	1.020	3.189	4.166!	6.028*	3.270*	7.126**
	发展型外出(是)						
	不是	.030*	.137	0.087*	.193	0.086**	.178*
社会保障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						
	否	.110!	.022*	7.329	5.443	1.082	.497
	参加新农保(是)						
	否	.888	1.429	8.467	2.133	1.380	1.020
工作状况	务工时间(3年以下)						
	3至5年	137.253	251.5	.600!	3.119*	4.167!	10.415*
	5年以上	2.306	1.043	.992	1.497**	1.724	2.079
	务工单位性质(个体户)						
	国有企业	8.613E-8	3.701E-7	7142747	2.191E7	.093	.688
	私营或民营企业	3.789E-6	3.042E-73	.623	1.180	1.610	1.076
	三资企业	2.600E-7	.053E-9	.187	.261	.378	.107!
	换单位次数(1次及以下)						
	2次	.169	.257	2.640	4.537	1.597	2.363
	3次	2.516	2.769	2.102	4.709	3.505	5.421!
4次	.649	.463	2.253	9.399	1.592	3.333	
5次及以上	.026	3.360	1.326	15.452!	2.143	18.822*	
换城市次数(1次及以下)							
2次	.606	.476	.754	.175!	.404	.159*	
3次	.121	.189	4.015	.180	.570	.104*	
4次	1071180.8	3062650.6	236435	.023	2.422E***	1.405E7	
5次及以上	.057	.008	.116	6.216E-9	.073*	.002***	
Nagelkerke R <sup>2</sup>		.580		.606		.444	
-2Log likelihood		147.541		185.430		409.700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p<0.1; \*:p<0.05; \*\* :p<0.01; \*\*\* :p<0.001。

影响更为深刻,而对于新生代来说外出后可能与乡村的联系较少,受到城市的影响更大,初始外出动机容易发生变化,对其发展取向的影响自然也就下降了。社会保障对新生代的发展取向具有积极作用,但对老一代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两代农民工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近年来政策层面强调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覆盖使得新生代更加认识到社会保障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务工时间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发展取向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则没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代人不同的生活世界,对于老一代来说城乡是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因此务工时间的长短会对其行为、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形成不同的发展取向;对于新生代来说,大众媒介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使得他们

对城市世界的了解提前了,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当中,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务工时间对其行为、观念的影响。工作流动性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则不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生代对其面临的漂泊状态的适应性要强于老一代,反而对其发展取向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也反映出两代农民工对留城发展的不同态度,对于老一代来说留城定居是留城发展的主流,而对于新生代来说“留城漂泊”也是留城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文关于“新生代城市发展取向更加具有流动性”的判断。

##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取向等诸多方面并不优于老一代,新生代并非是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决策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以下判断,“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间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在其受教育水平更高,就业更为自主并更有发展空间,收入更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更强,但吃苦耐劳程度低”(朱宇,2010:54)。但事实并非如此。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和老一代在留城发展取向的选择上高度接近,前者甚至还略低于后者,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城市融入性。这一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在群体性特征方面并不存在有利于新生代的趋势,特别是在证明新生代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外出动机三个指标上,文化程度和外出动机只是略好于老一代,这种差异只不过是出生在不同时期两代人之间正常的代际差别,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在收入水平上老一代则明显高于新生代。另外,在反映工作状态的务工时间、社会保障享有和工作稳定性上,老一代也明显优于新生代,如果加上收入水平,可以认定在就业层面上新生代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常态的结论,因为他们在就业层面上的现状也是所有80后新生代人群的共同特征。受教育程度的微弱提升并不足以抵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经验方面的局限,外出动机这一主观面向上的变化更不能改变新生代在城市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因此,无论是现实群体特征还是未来发展取向上,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出现本质性的进步。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发展取向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生活经验的差异所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和老一代在回乡发展取向上的选择上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年龄优势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他们在城乡发展取向上的选择是动态的,或者说,现在和老一代相似比重的回乡发展取向选择,反映的是新生代对现有制度、就业和生活环境形成的现实困境权宜的妥协。这从他们对返乡后非农职业选择取向明显高于老一代以及决定他们选择返乡非农发展的影响因素当中可以看到,就前者而言,这是两代人在发展取向上最显著的区别;就后者而言,返乡后的非农发展似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一种没有理由的“自然选择”,仅仅只有非发展型外出和没有养老保险的新生代更倾向于返乡务农,而对于老一代来说,返乡后的非农发展更多则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资本积累后的理性选择,其中务工经验丰富(务工时间更长、经历的工作岗位更多)的老一代更倾向于非农职业。因此,可以认为新生代高比例的返乡非农发展选择实际上是对留城发展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对于老一代来说则是现实工作、生活经历后的理性选择。另外,两代农民工在留城发展“共识”比例背后的影响因素中包含着不同的生活逻辑,新生代的留城发展是基于个体自身(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和未来保障程度(是否享有养老保险)的判断,他们坚持的是“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的生活逻辑。老一代的留城发展是建立生活体验(户籍和外出动机)和工作经历(务工时间、换单位次数、换城市次数)基础之上的,“我为什么能留下来”是其生活逻辑。

再次,经济社会变迁的作用表现在两代农民工上有两个层次,造成了新生代“精英化”的表象以及更高比例的非农发展取向。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兴媒介的大众化是新生代走向城市务工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两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前者使得他们微薄的收入也能够在穿着打扮和在一些生活方式方面和城里人保持一致,后者则让新生代无需太高的文化水平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各类信息,让他们接触到最新的观念、信息和知识。注重消费和时

尚生活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颠覆了公众对农民工刻板印象的同时,又给新生代农民工贴上了“精英化”和“更有希望”的标签;消费主义和网络传媒主导下的朴素公民意识又使得他们城市导向的发展取向不再建立在个人实际能力之上,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只不过其中的留城发展表现为显性而返乡非农发展表现为隐性而已。同时,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普通人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更多机会,身份和制度的淡化以及个人追求经济成功社会氛围的强化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这些都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希望通过工作脚踏实地在城市留下来的努力,而不是城市消费生活诱导下的“迷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面向城市的非农发展取向。但这并非他们群体要素和生态发生了真正意义的“新”变化,只是他们所处的“新”时代、“新”年龄、“新”的务农经历、“新”的家庭负担共同作用下的对城市生活“迷恋”的结果。当面临外部重大事件冲击时(比如金融危机),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乡村生活当中,重复老一代农民工的人生轨迹,也许他们的这个过程会更漫长,而盲目地滞留城市还会给社会整体的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因此,针对他们的政策制定,关键在于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也包括退而求其次的返乡非农发展取向)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新”能力的建设上来,新生代的“新”能力建设不但要包括户籍、福利等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更要注重学历再教育、职业技能、就业培训等内在能力的建设。只有将“新”取向与“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的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发展,否则新生代农民工不但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新”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麻烦制造者。

#### 参考文献:

- 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何绍辉,2008,《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青年研究》第11期。
- 黄乾,2008,《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 刘传江、程建林,2008,《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第5期。
- 罗静、李伯华,2008,《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春兰、丁金宏,2007,《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南方人口》第1期。
- 王兴周,2008,《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王宗萍、段成荣,2010,《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吴兴陆,2005,《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第1期。
- 熊波、石人炳,2007,《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第2期。
- 杨菊华,2010,《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人口研究》第2期。
- 姚俊,2009,《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调查——基于苏南三市的实证分析》,《城市问题》第9期。
- 袁松、余彪、阳云云,2009,《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青年研究》第4期。
- 周大鸣、姬广绪,2010,《回流的主位视角:企业农民工流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朱宇,2010,《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人口研究》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吕 鹏